

学人关注

观点秀场

编者按

近日,中国社会学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上召开。论坛共设两个主旨论坛,来自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围绕“家庭变迁”“代际关系”“养老政策”与“育儿支持”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论坛还呼吁建立家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 周海燕 张哲闻

近日,中国社会学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在线上召开。该论坛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承办,《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和社会学编辑部联合主办。论坛共设两个主旨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围绕“家庭变迁”“代际关系”“养老政策”与“育儿支持”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新时代的家庭结构变迁与挑战

与人口转变相比,家庭转变更为复杂。与会者首先研讨了“新时代的家庭结构变迁与挑战”这个议题。

中央民族大学杨菊华教授以《新时代的家庭转变:理论与现实》为题,聚焦于家庭结构变迁,她认为家庭为适应内外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转型”比“转变”更适用于描述家庭结构变迁,应从制度政策、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等来看待家庭转型。

通过对2014年CLASS数据的聚类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李婷教授以系统视角考察了老年父母与多个成年子女家庭形成的代际关系模式,借以探索家庭系统运行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的底层逻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经济效益最大化,把家庭作为一个经济体;二是社会资源保障体制,追求风险最小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刘汶蓉副研究员以《新时代如何保卫家庭?——家庭生活的制度性挑战及其重建》为题,分享了其通过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历史比较、国际横向比较及相关研究汇总的发现,日常生活的风险化促使行动者采取“快策略”(以自我即时利益和感受为准),与家庭主义的传承性原则(回报取决于他人和未来)相悖。研究者指出,新时代下家庭不再是一个自发具有凝聚力功能的单元,而需要系统的政策体系来重建以儿童优先、性别平等、代际公正为目的的家庭生活。

采用风险认知和信任视角,中山大学钟晓慧副教授以滚雪球方式对上海27位无子女老人展开深度访谈,考察了老年人如何理解“以房养老”政策,以及(不)参与的原因。研究发现,尽管老人没有子女遗产继承的考虑,但对“以房养老”政策的参与意愿极低。其原因主要为老年人对于在熟悉环境养老的安全感、对抽象政策系统不信任带来的高风险认知以及缺乏可信任代理人而出现的交汇口关闭。

上海大学陈蒙副教授和南京大学朱安新副教授对上述发言进行了点评。陈蒙指出,前两位专家均论述了家庭结构转变的复杂现状。但新时代下,一方面,家庭似乎在走向衰弱,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低风险之下,家庭似乎又更被需要,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关于“保卫家庭”一文,朱安新认为应明晰“保卫家庭”的策略究竟是对女性个体的支持,还是对核心家庭抑或其他家庭形态的支持。

积极生育政策下的育儿与照料前景

论坛上,积极生育政策下的育儿与照料前景成为与会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基于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双低”态势,中国人民大学朱健教授探索了低生育率的现实困境。她指出家庭的生育决策和国家的政策要求之间往往存在差异,生育成本是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婴幼儿照料是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提升和生育行为实现的瓶颈因素。因此,构建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的重要前提。

南开大学吴帆教授以《中国生育友好指数:理论框架与指标构建》为题,在分析中国低生育率形成的内在驱动力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兼顾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指标选取原则,并围绕经济、时间预算、服务、性别平等和文化五个维度构建中国生育友好综合指数。

聚焦深圳市的普惠性学前教育体系的构建历史和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春华副研究员讨论了构建普惠性学前教育体系对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的选择。研究发现,深圳市在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前两期,都未选择大力发展公办园,而是选择把民办幼儿园建设成普惠园,让民办幼儿园承担公益普惠责任,形成儿童托育公共化的深圳模式。

通过对读秀平台2847篇报道和中国知网388篇学术论文的编码分析,复旦大学沈奕斐副教授展示了近30年来“隔代育儿”的定义及被污名化原因。研究发现,“隔代育儿”一直未被清晰定义过,但又不断污名化。研究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是代际照料中权利关系的不平等,如代际冲突中老人更易受到歧视以及老人地位在家庭领域逐步丧失等。

南京大学副教授许琪和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对上述发言进行了点评。许琪提出有着多子多福文化传统的东亚之所以成为世界的“生育洼地”,与前两位学者研究中提及的性别不平等相关。东亚社会对子女的过度重视导致育儿投入成为“无底洞”,也是重要因素。苏熠慧认为马春华将国家角色与国家动机纳入其中,对育儿政策背后的国家角色进行了深刻讨论。针对“隔代育儿”研究,苏熠慧提出可进一步探明其被污名化的群体与动机。

本次冬季论坛是中国社会学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学术交流中迈出的重要一步。计迎春教授在闭幕式上对参会专家和听众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并呼吁建立家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聚焦家庭变迁、育儿支持与老龄化对策

——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观点分享

觉醒与力量：主旋律剧的女性形象构建



■ 肖辉馨 郭静

前不久,电视剧《功勋》正式完结。该剧以扎实而真实的剧情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再现了八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英雄人物的高光时刻。无独有偶,本年度高热收官的《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等主旋律电视剧,同样反映了建党百年历程中“理想与信念”之光辉。引人注目的是,女性角色不再是历史宏大叙事中的陪衬,而是灵动鲜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她们或是身先士卒冲锋一线的“大女主”,或是在日常琐碎中迸发惊人力量的普通女性,展现了女性在新中国革命建设中无私无怨的家国情怀和坚定坚韧的自我成长力量。

开时代之先的觉醒:女性自我价值与家国情怀相融

尽管在《觉醒年代》全部剧中,邓颖超在第三十集的天津女界学生运动中才出现,却丝毫不影响其革命精神的刻画。五四运动时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马骏引荐北京的赵世炎和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恩来给学生认识,邓颖超(此时名为邓文淑)代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发表“六誓”。此外,代表女性觉醒力量的白兰、机智勇敢的柳眉,尤其是敢于表达爱意,冲破封建时代枷锁,高喊要自由开放生活的易群先,无不彰显着《觉醒年代》的女性觉醒。这些鲜活的角色,体现了女性价值与家国情怀的紧密融合。

《功勋》八个单元剧中,有两个故事以女性功勋人物为主角,分别是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和为女性争取同工同酬权益并写入宪法的申纪兰。她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迥异,却共同体现了女性面对困境时的自信自立自强、敢于打破传统敢为人先的勇气,以及女性走出家门响应时代召唤和需求的家国情怀。《申纪兰的提案》从1947年开始讲起,当时妇女地位较低,农村妇女不能参加劳动。申纪兰刚出场便大胆泼辣地跳下婚车主动拉车,为了见到参军的新婚丈夫,她挥舞着红色头巾追赶,那一抹鲜红成为她性格特征的鲜明寓意。婚后的申纪兰,组织妇女生产,跟男人进行劳动比赛……

两位女性功勋人物的故事,并未停留于描述女性自身需求与时代话语之间的张力,而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深度还原了当时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为了突破自身困境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 阅读提示 ·

2021年收官的《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功勋》等主旋律电视剧,反映了建党百年历程中“理想与信念”之光辉。引人注目的是,女性角色在这些剧中不再是历史宏大叙事中的陪衬,而是灵动鲜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她们或是身先士卒冲锋一线的“大女主”,或是在日常琐碎中迸发惊人力量的普通女性,书写了女性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热忱的家国情怀和坚韧的内在力量。



《觉醒年代》中的赵纫兰

《觉醒年代》中的高君曼

顾家庭周全的坚韧:支持“小家”亦有“大家”理想

主旋律电视剧中,很多历史人物的故事内含着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家庭层面,则主要是女性的理解和无条件支持。

《觉醒年代》中,出于时代原因,不满10岁的李大钊娶了比他大6岁的赵纫兰。可以说,赵纫兰是李大钊的姐姐、妻子,更是使爱人能无所畏惧投身革命的重要依靠。赵纫兰没有念过书,却尊重丈夫的伟大信仰。在李大钊被通缉而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其行踪时,哪怕受到威逼利诱,她也从未透露过半句,被评价为“不知时局,却懂得大局”。《功勋》中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先生,为科研隐姓埋名28年,妻子孙玉芹在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依然全力支持。有相似处境的,还有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与“战斗英雄”张富清的妻子。

而这些妻子中,不少是知识女性,甚至被组织选派出国留过学。正因此,电视剧的“弹幕”里有这样一种声音:无法理解高知女性留守家庭的选择。《无名英雄于敏》单元中,于敏的妻子在一次家属“吐槽会”上回应了这个问题。她说:“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咱们可不能倒下了,这一倒下,家就没了。”这不仅仅是支撑小家庭的责任感,更是一种家国责任的自觉。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她们的选择理解为牺牲自我,而应看到在传统文化包容坚韧的力量之外,也闪烁着带有时代印记的、光辉的理想主义。

迎质疑而上的追求:女性赋权须终自我确认

随着自身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不断增强。基于此,近期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用大量镜头聚焦女性在时代变迁中,面对各种杂音的自我观照、自我确认与自我赋权。

《觉醒年代》着重相对较多的女性是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她对丈夫不离不弃,对家庭有情有义。在陈独秀被人污蔑“伪君子”时,高君曼说:“如果我因为这三两声蚊子苍蝇嗡嗡叫就哭哭啼啼、闻之落泪,那我就不是当初你要寻找的那个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高君曼,身为知识女性,无论是追求真理还是婚姻爱情,都遵从自己的内心,一旦认定目标便不会被教条或流言所束缚。

《理想照耀中国》之《青春之歌》以王会悟为原型。王会悟曾立创办女校之愿,解思想之束缚,却遭到了众人的质疑。剧中有一幕学生被家长强行带走的场景——雨中,众人急促敲门,学生家长“解掉裹脚,不是害她吗,以后怎么嫁人”的质问和母亲的劝解,形成了一个逼仄的舆论空间。但王会悟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对着镜子剪掉长发,开始了下一次为思想解放而奋斗的历程。由此可见,女性赋权并非简单地从外部获得权力和资源,而是一种社会交往、参与、表达与行动实践,是公共生活中自我身份的确认。

众所周知,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导致女性形象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存在偏见与失语。但每个人都拥有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力,女性不应该被排除在外。本年度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功勋》,以宏大叙事所构筑的信仰为筋骨,以微观情感生活为血肉,以区别于差异的、隐匿的、孤立的和渺小的女性刻画,而使独具颗粒细度的“她力量”得以彰显,体现了扎实的创作态度与能力,完成了理想价值观在公众中的传播与引导。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社会工作介入全职妈妈双重困境的实践研究——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个案分析》

作者:何艳棠 冯英子 林虹

本文通过对一例全职妈妈陷入“丧偶式育儿”与“丈夫婚外情”双重困境的个案实务反思,重点探讨社会性别视角在妇女社会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发现,当女性陷入此类困境,社工首要的介入目标是帮助其摆脱密集母职、转变非理性认知和修复亲密关系。设计和开展服务时,社工需着重为女性群体赋权,强调夫妻共同参与、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以及共同肩负育儿责任。在社会性别视角下,“丧偶式育儿”和“婚外情”个案的求助者虽然是女性,但更重要的是推动男性作出关键性改变,纠正家庭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改变男权制和父权文化对家庭的负面影响。

来源:《社会福利》2021年第8期

《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困境与完善进路——以147个相关民事讼案为样本》

作者:蒋月 苏琦 潘锦滔

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147件人民法院审结的涉及职场性骚扰的民事诉讼案件,发现我国当前发生的职场性骚扰中,妇女指控男性实施职场性骚扰的占九成多;逾四成案件是上司或上级涉嫌骚扰下属或下级;肢体行为占性骚扰近五成。但是,只有不足三成职场性骚扰指控获得法院确认,其中,职场性骚扰取证难、举证难是重要原因;受害人救济不充分问题也比较突出。为减少和消除职场性骚扰,法律应明确采取“零容忍”立场,采取预防为主,教育、矫治和惩处相结合,增加干预措施和强度。作者建议利用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契机,立法界定性骚扰的概念,以促进性骚扰的统一认定;明确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主体责任,建立单位反性骚扰的机制;规定干预措施、程序规则、处罚规则和救济程序。在司法中,明晰各方的证明责任,适当降低职场性骚扰指控者的举证责任负担;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和赔偿水平,从而公平保护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相对收入与中国夫妻地位认同——基于“社会比较-性别规范”框架的分析》

作者:张文宏 刘飞 项军

中国夫妻地位认同仍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基础,地位决定论强调夫妻任何一方绝对收入的增加都会提升双方的地位认同,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夫妻之间的收入比较对双方地位认同的形成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作者通过构建中国夫妻地位认同的“社会比较-性别规范”分析框架,利用2010-2017年间五轮CGSS数据的分析发现:夫妻之间收入比较与社会性别规范共同形塑了双方的地位认同。相对收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已婚男性的地位认同;同时,受到传统性别规范的制约,收入并不会成为已婚女性与配偶比较的资源,相对收入的变化也不会显著影响其地位认同。“社会比较-性别规范”的理论框架更好地诠释了夫妻地位认同的形成机制。

来源:《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

(范语晨 整理)

学术视窗